'97.2 （总第七十四辑）



要目

- 天津英租界两个抗日据点活动纪实
- 从科学救国到桃李满园——记陈荣悌教授
- 我的父亲马寅初
- 香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始末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顾　　问：黄炎智　田桂林　杨大辛

主　　编：方兆麟

副 主 编：张笑平

编　　辑：李国丽　张　柱　康　明

　　周桂兰　仉志刚

本辑执行编辑：李国丽

本辑版面编辑：康　明

第 一 读 者：张敦书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7·2（总第七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武清县长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50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914—2

K·379　　定价：5.2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7·2(总第74辑)

人物春秋

我的父亲马寅初 …… 马本寅(1)
毫毫之年话平生 …… 吴廷椿(31)
医学博士景恩棫 …… 景寿仁(55)
回忆黄钰生先生 …… 刘　焱(58)

抗战岁月

西安事变亲历记 …… 李绍曾(68)
南京大屠杀目睹记 …… 王　寅(73)
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 …… 卞僧慧(77)
在冀西抗战的日子里 …… 张桂英(84)
天津抗日回民支队 …… 房玉苓(87)
陈泽民愤书《八年苦》 …… 唐玉廷(92)
学生时代的一段经历 …… 王遵级(96)
回忆我的母校自忠中学 …… 齐剑平(104)
日本播州日中友好团在中国 …… 张访朋(113)

津港情结

香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始末 …… 高平叔(120)

China

EC30/31

开通津港航运的“红色侨商”高友庆 …… 徐景星(129)
爱国商人庄保庆 …… 王　寅(132)
我父自香港来 …… 傅金如　傅镛如(134)

经济谈往

国民党天津航政局概况 …… 陈　健(137)
我国废棉生产和出口概况的回顾 …… 李捷三(147)
国民党天津市主要物资管制处…… 钱萃恒(156)
北洋烟草公司经营始末 …… 曲振明(160)

文化天地

卢慎之晚年卖书 …… 刘行宜(166)
濠园文物多琼瑶 …… 陈自强(169)
书法名家胡宗照 …… 常来树(172)

政协之星

从科学救国到桃李满园
——记陈荣悌教授 …… 萧胜利(176)

封面照片说明 …… (86)

China

我的父亲马寅初

▽马本寅▽

青年时代的马寅初

一、青少年时期

我父亲马寅初生于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旧历五月初九)，排行第五，取名寅初，字元善。因他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是难得的“五马”具全的人，在浦口镇里一时传为佳话。父亲自幼聪明伶俐，我祖父曾寄予厚望，打算让他在镇上念完私塾后继承家业，作些管帐理财之事。但父亲对私塾中自朝至暮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诵古书毫无兴趣，故经常遭到封建意识浓厚的祖父严词斥责甚至鞭挞。但父亲自幼天生一股“憨大”倔强脾气，“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父子间矛盾日深，时相龃龉，几个兄长也频遭连累一起受罚挨打。19 世纪末期，维新思潮盛极一时，在群山环抱的嵊县也激起了微波，泛起了层层涟漪。受其影响，时年十五六岁的父亲决心离家去上海求学，却遭到祖父的强烈反对，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桎梏，抗拒父亲对他前途的安排，他曾愤而投河，幸被一位名阿牛的船工及时救起。“知子莫若父”，此举终于迫使祖父忍痛让步。17 岁的父亲，携带简单的行装，辞别了严父慈母，踏上了新的征途。

父亲在上海求学期间，生活艰苦，可谓“衣不求华，食不厌蔬”。每晚秉烛夜读，天长日久，患上了近视眼。父亲刻苦钻读、毅力惊人，屡次考试皆名列前茅，颇得老师赞赏。数年寒窗，磨炼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今后一生中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1903 年秋，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5 年父亲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即以公费“留学”派往美国深造。这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亲自召见父亲等几位去美留学的学生，并发给每人一张由袁世凯署名的证书。

1907 年，父亲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逗留数日，尽情领略这异国风采，但父亲却无暇顾及于此，匆匆奔赴最终目的地——纽海文耶鲁大学。

父亲早年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本打算在矿冶方面干一番事业，但由于他体质较弱，搞矿冶并不合适，故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即有转系改行之意。进入耶鲁大学后，从学习和生活中意识到“实事救国”固然重要，但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要“民富国强”，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因此，在耶鲁大学学习的父亲决定转入经济系学习，并于 1910 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经济学博士学位。

父亲留学期间，尚能按期领取公费。后因国内政局动荡，资助

时有间断，后竟宣布停发公费。此举无异釜底抽薪，搅乱了学习情绪，迫使部分学生萌发辍学或另觅他途的打算。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系父亲留美同学，二人同住一室，朝夕相处。王氏早期归国后即任北洋政府要职，曾力邀父亲弃学归国从政。父亲是矢志念书之人，从不眷恋仕途，虽然前面道路荆棘丛生，但他矢志完成学业的决心毫不动摇。从此，他到码头扛木头，到饭馆洗盘子，有时还兼做饭馆的帐房先生，用自己的劳力换取今后学习和生活的费用。

父亲刻苦的学习精神、正直简朴的生活作风，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财政学专家赛利格曼教授的注意，并真诚表示愿助一臂之力。1911 年父亲获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题为《中国财政收入》。1914 年在赛利格曼教授的指导下，父亲以《纽约市财政》一文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父亲这篇博士论文《纽约市财政》主要阐述了纽约市财政的优劣利弊，其财政预算的编制方法、监督检查方法，公债的发行和募集方法，征税范围及税率确定原则等，是一本涉及到纽约市的财政、预算、税收各方面问题的论著，论述精辟，后被哥伦比亚大学选定为该校一年级教材。直至 68 年后父亲百岁寿辰之际，我国经济学界前辈李权时先生在题为《一生研究经济，坚持真理不渝》的文章中写到："1921 年冬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拜读了先生 1914 年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一书，当时虽未见先生之面，但对先生的学识才华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颇为钦佩。"

赛利格曼教授认为父亲是一位有前途的经济学家，遂邀请父亲留校任教。但父亲牢记他出国留学的目的，虽然留校待遇丰厚，但他热爱祖国，为国效劳的初衷坚定不移。他婉言谢绝了老师的盛情和美意。1915 年，父亲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 10 年、灾难深重的祖国，时年 33 岁。

China

二、回国初期

父亲自美返国后，初任职于北洋政府财政部。不久，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后又兼任经济系主任，时为1916年。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职后，蓄意改革，校风渐有起色。蔡元培广延学有所长、思想进步的人士担任教授。父亲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沈尹默等都是当时被蔡元培延聘担任各科教授的。父亲当时在北大法科任经济系教授，讲授应用经济学，如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论以及汇兑论等等，开始了他在北大长达11年的教授生涯。

父亲历来重视研究实际问题，从不空谈理论。为使学生有机会联系所学科目，他极力推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倡导学生兴办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后又促进成立“消费合作社”等。50年代，当父亲重返北大担任校长时，他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大学既搞教学又搞科研，用科研成果教育学生，经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可以源源不断地充实科研机构，成为科研的生力军。当时、郭沫若同志主张科研应由科学院去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老曾有过争论，毛主席为此曾约二老长谈过一个晚上。直至今日，多数高等院校皆从事科研工作，有些科研成果得到国家的重视和奖励。

父亲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术性研究会。北大经济学研究会成立后，父亲曾多次应经济学会的邀请莅会发表演讲。

父亲谈其治学经验时曾说过，在学习和研究中要防止“两个不良”。其一是“营养不良”，无一定文史基础，无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无第一手资料的汇集，搞出来的东西非面黄肌瘦，即畸形发展；其二是“消化不良”，对于书本知识食而不化，无论是古今名人或某个权威的学说，都要钻研、咀嚼、思考，切忌囫囵吞枣，人云亦云，随波

China

逐流，浅尝辄止。

1918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北大于同年 11 月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连续举行了一天的演讲大会，父亲应邀在会上作了演讲。参加演讲的还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陶孟和、陈惺农、胡适等。蔡元培当时思想较激进，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一篇著名的演讲，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父亲当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他指出："若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必去，断无与劳动者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他抨击官僚、反对军阀的思想已溢于言表。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热情地支持了当时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蔡元培对北大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如设立大学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为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北大设立了教务长一职。1919 年 4 月 9 日，父亲被评议会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下令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委派胡仁源代长北大。此举无异火上添油，一时掀起了"挽蔡驱胡"的热潮。父亲自担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后，在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封建教育制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工作中他与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蔡十分敬重。父亲曾上书坚决要求恢复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否则将辞职以示抗议。

1920 年仲夏之际，父亲赴上海、杭州等地考察经济界情况，并与上海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合办了"上海商学院"，初隶属于东南大学，后独立改名为"上海商科大学"(该校于抗战后停办，胜利后复校，易名为"国立商科大学"。父亲在该校自任教授，专讲纯粹经济学，并邀请我国会计界老前辈潘序伦先生为教务长)。192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父亲重返北大。

据家母回忆，当时我家在西河沿赁屋而住，后又迁至报子街勤良巷定居，前后共 11 年，直至父亲 1927 年脱离北大南下为止。这一时期他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晚上他聚精会神地阅读、写作直至深夜，习以为常。那时候，阅读大部头经济学书籍的读者尚不多，他有鉴于此，遂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不辞辛苦奔赴全国各地公开发表演讲，藉以向广大国民广泛介绍经济知识，评论现实经济问题，揭露弊病症结所在，指示今后奋斗方向。其行动对启迪民智、揭露军阀和官僚们的庐山真面目起了不小的“激浊扬清”作用。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据统计共200 多篇，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1923 年后陆续出版共 4 集，题名为《马寅初演讲集》。我国经济界前辈许涤新同志在《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一书序言中写道：“我从 1928 年起，从文学理论转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读了他的《经济问题讲集》(即《马寅初演讲集》)。我之初步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经济问题，就是从马老的演讲集得到的。马老是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老师。”《演讲集》内容恳切动人，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他为中国经济的复兴奉献一颗赤子之心的真挚感情，使听者、读者受到极大的鼓舞，故《演讲集》出版后曾轰动一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为更多地了解父亲早期的经济思想和学术成就，现分别就几方面加以叙述。

(1)撰写经济专著出版

1921 年父亲基于乡谊出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该行创立于 1917 年，为浙江省商业银行中之最早者。父亲此时即着手汇集汇兑方面的资料；翌年父亲又就任中国银行顾问兼总司券(总发行)，即开始撰写《中国国外汇兑》一书。盖存款、放款与汇兑三项业务乃金融业之繁荣所系，父亲认为：我国国外汇兑之权者，操自外人，华商银行中，虽有经营国外汇兑者，然范围极狭，规模不大，不足与洋

商银行相拮抗。自五口通商、中外互市以来，中外贸易操于洋人之手，华人不过任代表办土产、代销洋货之劳耳，于是汇兑之权操自外人，华人无置喙之余地，不仅关系国际贸易消长之汇兑行情由彼议定，即用以铸成宝银与银元之大条银，亦复由彼输入，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之巨，于此可见一斑。因此，父亲著书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说："关于国外汇兑之种种问题，华商莫知其详，国人莫明其妙，即老于钱业与银行业之人，亦不明究竟。为揭破国外汇兑奥妙起见，特著此书，一以供国人应用之知识，一以备学者研究之资料。"该书详细阐述了外汇涨落的原因，各地汇兑的计算方法以及国外汇兑记帐法等，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该书出版后，在经济、金融界中流传甚广，影响至深，对发展民族经济是有贡献的。

在这段时期，父亲进行了广泛的演讲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各主要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昌、汉口、厦门和山西等地，前后发表了 200 余篇演讲，所论皆切中时弊，如鸦片问题、劳资问题、银行、货币、交易所、信托公司国际贸易、国外汇兑以及一般的财政问题与原理，涉及面广，且有精辟论断。

(2)打击官僚军阀

父亲认为："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一文中说："一旦做了官，做了督军巡阅史，很少不满载而归的。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3 年 12 月 1 日，父亲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了题为《我国经济界之三滥》一文。文中谈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乃有三滥：1. 滥借内外债；2. 滥铸铜元与辅币；3. 滥发纸币。三滥之根本原因，实系军阀之祸。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在《上海之工部问》、《中国经济恐慌之根本原因》以及《经济要素》等一系列论著中，父亲列举事例尖锐抨击了旧军阀，旧官僚的种种倒行逆施。他大声疾呼："军阀、军阀，真今日万恶之所归。若辈一日不去，则我国无富强希望，政治无人轨道之日，愿我人民，急

起图之!”“利用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父亲这一突击性格赢得了国人的爱戴。

(3)反对不平等条约

1925 年 8 月 20 日,父亲在山西大学发表了题为《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经济之关系》的演讲,从五个方面列举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对外人竟在我国境内肆无忌惮地发行钞票一事,父亲亦进行了驳斥和谴责。

同年,父亲又在北京师大发表了抨击不平等条约的演讲,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经济的灾难。他认为:不平等条约影响我国经济最大者,一是领事裁判权,二是对外贸易取缔权。经济落后的国家欲开发其本国的资源,必须引入外资。美国曾利用英国资本始发展到当时的水平,我国欲发展经济,亦非利用外资不可,但外商所提条件十分苛刻,其一为索取担保,其二则要求优先权,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势力范围”,结果,恶果从生,把中国经济搅得一团糟。他呼吁:“必须广作宣传,造成舆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外人压力再大,收回权利亦指日可待。”

他还发表了《中国外债之特色》、《中国关税问题之研究》、《汇丰银行》、《关税特别会议》、《收回权力与关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和对外贸易取缔权,主张将关税和盐税立即收回并存入中国银行。

1925 年 11 月 19 日,父亲在北京洋商公会演讲,题为《在中国的洋商》,与会“听讲者”皆系在华“经商有术、腰缠万贯”的洋商们,故很受外界注目。在讲话中,父亲表示欢迎引进外资,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取消洋人在华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他认为洋商在华必须与中国商人处于同等地位,不能袒洋抑华。他正告在座的洋商谓:“中国正进入产业革命和社会改造时期,我们欢迎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真心诚意的合作,可不要侵略者。”事隔不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佛莱瑟在北京英文日报及北京英文导报上载文攻击父亲在洋商公

会的演讲。佛莱瑟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特有的腔调强辩说:“外人所持的治外法权,非外人搜攫所致,而是情势使然,但目前当做的事,似非先整理中国国事,使之秩序有序不可。”一言以蔽之,佛莱瑟的谬论是中国必须先有一个好政府,并纳国事于正轨后,外人始愿放弃治外法权。真是“巧言如簧,颜之厚矣,”明明是“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说些自欺欺人的话。为此,父亲在上述两报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质问:“当中国被外人侵略,做一个奴隶时,能把国事纳入轨道吗?一个献媚于外国的政府,帮助外国盘剥重利者的当局,会变成一个好政府吗?”在历数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历次侵华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后他愤怒地控诉:“诸如此类,激怒了中国人民,使之忍无可忍,遂起反抗,这应归咎于欧洲各国,因彼等视我国如金鸡,拔其羽毛;如母牛,取其乳而宰其肉,这种不平等条约留在中国一天,我们谈中国和平是无用的。”这篇反驳佛莱瑟的公开信,义正辞严,成为父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一篇檄文。

(4)主张旧币制的改革

父亲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稳定,他自美返国后,与金融界广泛接触,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极为丰富的一手资料。他观察到由于京钞涨跌无常,助长了买期货的投机事业兴起,投机家大做买空卖空,搅乱了金融市场。因此,他认为币制非改革不可。1920年父亲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连续发表三次演讲,畅谈了《我国老币之影响》,主张对我国币制进行改革。1921年父亲又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作了题为《我国币制的整理》的演讲,对当时混乱的币制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剖视,并论证了整理和统一币制的途径,澄清了当时金融界对币制的模糊认识。我国经济界老前辈,父亲生前同窗傅光境教授回忆,父亲早年曾提出三个平衡原则:一是财政收支平衡;二是信贷平衡;三是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平衡,对稳定经济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傅教授回忆说:“马先生1922年担任中国

银行总司券，与张嘉璈副总裁、总司帐吴达铨、总文书陈其采并称为中行四大金刚。”

(5)**首创中国经济学社**

中国经济学社是我国最早的全国经济学学术性群众团体，由父亲、刘大钧等人于 1923 年在北京发起创立，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戴安乐也是发起人之一。该社宗旨为：提倡经济学之高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辑出版各科经济书刊，襄助中国经济之发表与改进。学社成立之初，父亲被推选为副社长，刘大钧为社长，旋后，父亲即被推选并长期担任社长，到 1936 年，社员多达 200 余人，皆系当时著名教授、实业家、银行家等。政府要员如宋子文、孔祥熙、邵元冲、陈布雷、胡适、张嘉璈等，亦为该社社员，胡汉民及蔡元培为该社名誉社员。历届年会都集中讨论国家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并将宣读的论文择优公开发表。由于与会人士皆系当时经济界、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故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针对性强，颇受各方重视。

学社最初出版《中国经济学社社刊》，后决定改成学术性较强的《经济学季刊》，按期出版，直至抗战爆发。学社还编印了多种专刊，如《关税问题专刊》、《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建设》等。另有经济丛书多种，对国内经济界、实业界有较深远的影响。

父亲长期领导中国经济学社的工作，因他热心社务，事必躬亲，故甚得社员拥戴，其所言所举在社内亦颇具影响。历届年会期间，父亲以身作则，或带头宣读学术论文，或发表学术演讲。如 1930 年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研究》、《关税征金与改革币制》；1931 年的《德国之营业税》、《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1933 年的《新商会法与工商会法》、《凯塞尔社会经济学原理之解释》；1934 年的《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1935 年的《中国经济之改革》；1936 年的《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1938 年的《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等等。上述各篇论文内容皆涉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类

经济问题，有分析、有主张、有建议，在政界和学术界中都有相当的影响。

历届年会还通过各项重要议案，提供政府参考施行，其中某些提案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如《太平洋如发生不测吾国沿海各省经济应如何保护》等。总之，中国经济学社虽系一民办学术性团体，但因其成员皆系社会各界名流，具有一定号召力，故在推动和发展我国经济事业中是举足轻重的。

三、南　　下

1927 年夏，父亲离开北大，举家南返，并就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职。同时，父亲在杭州财务学校任教，并兼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稽核。1929 年，父亲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父亲在南京工作期间还定期去陆军大学讲课，每周末乘车返杭州途经上海时，又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教授。1932 年，父亲又主持了交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他继续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经济动向，并针砭时弊，著书立说，发表大量论文和演讲，为国事奔走呼号，一如既往。这一时期他所撰写的论文分别发表在《经济学季刊》、《银行通报》、《东方杂志》等十数种期刊上。事后，部分论文由商务印书馆总纂后，于 1932 年出版，书名《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一集)。本集共 44 篇文章，内容涉及银行法、钱庄法、储蓄银行法、营业税，票据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公司法、盐税、田赋、银行与物价、金本位，以及各种世界经济问题及内政问题等，成为当时一本十分畅销的经济学专著。

1929 年前后，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父亲的经济学术专著《中国关税问题》及《中华银行论》。《中华银行论》一书系根据银行学原理，深入讨论了我国银行业之各种业务，如存款、放款、贴现、

押汇、收买期票、发行钞票等等。书末附有银行发行记帐法，为一般银行簿记专书中所不经见的材料。

父亲根据在交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所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改造》，1935 年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分 10 篇，约 40 余万字，涉及的内容有国际贸易、金融业、经济统制、利用外资、财政问题、银行问题等，在当时被公认为经济界的名著。在自序中他写到："从目前经济情况而言，既遭外力摧残，又无自卫能力，前途危险，至为可虑，不得不在此风雨飘摇局势下，觅得一对策。"字字句句渗透了他为国事忧患的深情和要为此而奋斗、把垂危的经济从深渊拯救出来的决心。书中第六篇《利用外资》，详细阐述了利用外资的三种方式：即(一)借款于中国政府，外人仅居债主地位；(二)外人与中国政府合办各项事业，可居股东地位；(三)特许或称租让外人在中国法律范围内，可自由使用其资本和技术，期满后产权须无偿地还中国。纵观此篇内容，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视之，亦发人深思。

1935 年 11 月 3 日，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金融政策。父亲为此撰写了专著《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一书，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两大篇约 35 万字。畅论了新金融政策颁布前后各项问题，以供朝野关心币制者阅读。他认为，中国的生产问题，须从经济及货币两方面加以研究。《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一书评论货币，而《中国经济改造》一书则着重于经济体制方面，两者相辅而行。盖一国之生产问题，不能单从经济方面求解决，必须从经济转而至于货币；亦不能单从货币方面求解决，必须由货币转而至于经济。

父亲当时虽在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任职，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不同意就公开反对，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南京任职期间，父亲曾为蒋介石讲授经济学，蒋介石每遇判定经济政策或需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时，皆约请父亲到私邸讨论面谈，每周约一二次。实际上父亲已成为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

问。但他仍是我行我素，从不阿谀奉承，甚至不惜与当时的权贵孔祥熙、宋子文就经济问题进行辩论。

1935 年 1 月 20 日，南京《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对党政人员贡献几句话——确守公务上的责任》。这是一篇不指名地攻击父亲的文章，文中指责父亲的种种言行不符合“党国利益”。为正视听，父亲于同年 2 月 3 日及 2 月 16 日，分别在《武汉日报》及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对最近几种金融立法的说明》一文，就《中国日报》对他的攻击进行了义正严辞的反驳。他说：“我服务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弊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凡献身党国之同志，义所应尔。故对于危害党国，借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岂有他哉！”由于文章触到对方痛处，2 月 26 日，中央社记者又以走访财政部发言人的形式，以《对马寅初金融立法说明，财政部发表的辩证》为标题，进行辩论。

这一时期，父亲虽忙于政事，并穿梭于各大学讲坛之间，但仍时刻注视着社会的经济动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对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他是从不缄口的。

当旧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列强乘机挟其经济优势，借在华特权的庇护，蜂拥而入。外人在华设立的公司，名目繁多，其中不乏买空卖空搜刮民财者，“万国储蓄会”即为其中之昭著者。此种储蓄会往往高悬巨奖以为诱饵，吸引民众零星之资金，贻害我国经济至巨。“万国储蓄会”利用这种巧取豪夺的方法，短期内积聚的资金已达 6500 万元，若任其自然发展，则后患无穷。为使国民洞察其奸，1935 年 1 月，父亲在南京陆军大学作了题为《有奖储蓄与民族自觉》的演讲，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储蓄”的真相。

为消除“万国”等储蓄会之贻害，父亲遂提出结束“万国”、“中法”两储蓄会之具体措施，即以南京或杭州为中心，组织全国储户联合会，代表全体储户与“万国”、“中法”两总会交涉，同时向财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